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4.014

交易费用理论视角下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阿力只发

(中共凉山州委党校,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脱贫后的凉山彝区,虽然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生产条件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力资本积累低等多重制约因素重叠,导致农村地区内源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差。为探索补齐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分析凉山彝区农业发展现状,基于构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逻辑,分析研究凉山彝区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阻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交易费用理论;农业高质量发展;凉山彝区

中图分类号:F327.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81-07

Study on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angshan Yi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LI Zhifa

(Party School of the CCP Liangshan Prefectural Committe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Though lives of people in Yi regions have improved greatly afte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backward production conditions, delay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nd lower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s have come into force and resulted in lack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poor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o explore and remedy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angshan Yi regions, we first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then studied the obstructing factors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angshan Yi regions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 log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n we proposed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Liangshan Yi regions to achieve their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iangshan Yi region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由“增长逻辑”转向“发展逻辑”,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挥自身优势,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①。这是“十四五”时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和要求。作为以农业生产和就业为主的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彝区脱贫后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高质量发展以现代产业

体系为构成主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体现出构建产业关联畅通以及经济循环流转的城乡发展格局,落后的彝区需要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着手。凉山彝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以农业为主,但是农业发展在交通运输、土地流转、产品市场化品牌化、人才支撑等方面存在诸多约束和困境,而交易费用理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从机理上解释和厘清制约因素。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实地调研方法对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为缩小区际差距,实现更加协调充分的发展提供参考;对提升农村人口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参与性,实现内涵

收稿日期:2021-08-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研究(21XMZ00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深度贫困彝区经济社会内生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19SX17)。

作者简介:阿力只发(1990—),男(彝族),四川金阳人,助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创新与协调发展。

式发展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一) 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对高质量发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根据人民日报的提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②。根据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对经济发展质量做出科学的评判^[1];可以体现为宏观经济、产业和企业等层面^[2],它在内涵上表现为多维性和丰富性^[3-4],是从规模扩展的发展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效率的发展。林毅夫^[5](2020)从结构经济的视角研究认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基于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区域经济,将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是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原则。他从技术差距、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周期三个维度来考察产业,并将其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等五种产业类型。

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4](金碚,2018)。当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章比较少,黄修杰^[7](2021)研究认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值占比、高程、劳动力就业结构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刘涛等^[8](2020)认为城镇化率、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值占比、人均能源消耗量等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可见,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是多维的,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四个方面。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或基本实现条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一是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研究一般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结合农业发展实际现状,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9-11],主要包括经济和产业结构、产品质量和效益、农业规模和技术、绿色发展、人力资本水平等几个维度。二是对农业各领域及与不同业态结合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如农业保险、数字农业、制度供给等,从

不同的视角切入提供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12-14]。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导向与路径方面^[15-16],认为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要以供需适配为遵循,通过规模经营和强化技术创新,实现特色化和品牌化,提升核心竞争力。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相对于较发达地区面临着更大的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上的压力,而成本“地板”则主要来源于农业的供给侧,即农业发展中的高交易费用问题。交易费用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基于“为什么在市场中会产生企业”的问题而提出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市场中稀缺的交易活动需要交易成本,企业通过科层或权威将外部契约化为组织内部交易,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后来经过威廉姆森、康芒斯以及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所发展。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分为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交易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人的因素则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康芒斯指出,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无数次交易构成了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转,并受制于制度框架的约束。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指出,交易费用范式中有三个基本的经济命题: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假设;二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三是机会成本,即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沈满洪^[17](2013)认为,交易费用主要由搜寻信息的费用、达成合同的费用、签订合同的费用、监督合同履行的费用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即经济活动交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的支付成本。综合以上观点,交易费用是参与经济活动交易的人,在现有掌握的信息和条件约束下,根据供给与需求情况参与交易活动而支付的必要成本。其主要构成因素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程度、交易的频率以及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为参与交易的能力、决策能力、对交易风险的态度、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

(二) 交易费用理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机理分析

从文献述评中可知,交易费用理论内涵和构成因素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及影响因素有内在的耦合关系。交易费用的实质是交易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制度、政策设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信息等不完善、不健全以及人本身存在的知识局限构成一系列约束集;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条件、技术条件、产业结构、政策和市场条件等外部约束

与人自身的资本积累相结合的结果,两者都包含了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以下将构建交易费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经济逻辑,从交易费用的各维度出发,厘清农村地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如图1所示,从供给端看,土地资源及其制度因素,流转限制农业局限于小农经营;生产环境和信息技术约束下,农业经营回报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市场落后,产品质量和效益低,降低交易频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约束下缺乏企业家精神。从需求端看,人们对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健康性要求增加,从而要求有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因此,两端形成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互动,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本真性质的体现,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发展结果的评判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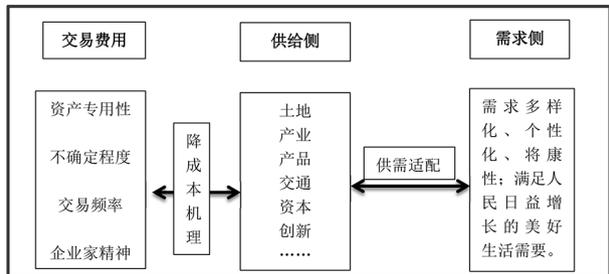


图1 交易费用理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逻辑

二、凉山彝区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以下将从农业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经营目的、农业价值链等四个方面分析凉山彝区农业发展现状。

(一) 经营规模: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

凉山彝区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根据调查发现,在高海拔地势平坦的农村地区,平均每户村民拥有4~6亩耕地面积;低海拔地区平均每户村民拥有3~4亩耕地面积,并且每户村民的土地分散分布,每户村民拥有的土地平均8~15小块。因此,农业生产经营主要以小农家庭分散经营为主。

近几年,各地区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着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农业合作社等建设,提高了农村土地整合经营的可能性。在2015年以前,由于资金短缺,凉山地区集体经济“空壳村”比例高达85%。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政府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意见》《凉山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奖励办法(试行)》等,并采取“支部+专业合作社+技术能人+贫困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等模式,每个贫困村配套产业发展资金30万元以上。2020年在7个未脱贫村共投入2.3亿元资金,扶持壮大215个村集体经济。这提高了农户以土地要素入股或以农产品入股方式参与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土地整合经营^③。但是以龙头企业+农户、股份制合作等组织化程度高的农业规模经营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和发展。

(二) 经营方式: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

由于凉山彝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以资源为基础而非以科学为基础^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农业技术,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通过在彝区的走访调查发现以下问题。

1. 从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上看,农业生产设备以低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体力工具为主,使用机械耕地的还不到总农户的5%,几乎没有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农业机械。2020年《四川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凉山州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56.48%,占比超过第一产业总产值的一半。但其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仅为187.48千公顷,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4.96%。即使在安宁河谷地区,农业技术发展也十分有限。如近年来西昌市发展葡萄产业,种植面积达10万亩,投产面积约5.5万亩,总产量约达15万吨。但是由于存在大棚搭建不科学、栽培管理不规范、冷链运输不足等问题,使葡萄的品质下降^⑤。

2. 从农产品品种上看,农村居民不愿意引进新品种,基本使用原来的农产品,抵御害虫性能差,收入低。但有研究表明,农业技术包括开发高产品种、灌溉技术引进和创新,能够抵御害虫造成减产以及降低气候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安全性和农业收入,缓解贫困^[23,27],提高农户家庭的福利^[26,30]。

(三) 经营目的:自给自足而非市场交易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二是要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劳动产品若是在自给自足之下消费,则只体现其使用价值,虽然自产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食品消费支出,但不能带来盈利。凉山彝区农村居民的农产品生产都是基于满足自己家庭消费需求,而不是为了进行市场交易社会消费。农村居民的农产品如土豆、荞麦、玉米、水稻等收获后第一年没有消费完,一般都会继续储存以便第二年消费。通过访谈,村民的农产品消费剩余销售的仅占总产出的5%左右,这种

交易大多是邻里买卖。其次,村民养的家禽、猪、羊、牛等都是邻里买卖,只有在举家外出务工或大批量卖出的时候才去集市交易。

(四) 产业链:独立生产经营,供需链和价值链断层

产业链包含了产业层次、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资源经过加工的深度、能够满足人民需求的程度等含义,大致可以从产品供需链和价值链两个维度分析。农业产业链则“指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产业关联关系的产业网络结构”^[18]。从农业供需链看,凉山彝区农产品自给自足性质,产业层次低,生产的农产品属于初级产品,其产出的附加值低。其次,由于没有参与市场交易,在满足社会交换和消费需求方面,仅停留在满足农户自身消费需求上,缺乏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功

能。从农业价值链看,农业产业链的构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构建“以工促农、以城促乡”机制的重要途径^[19]。但凉山彝区的初级农产品没有再次经过加工,在产品生产后农户直接自己消费,农产品与工业企业相分离。同时,生产剩余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狭窄,没有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互联网+”等电商服务平台相结合。农产品在生产、加工、销售等过程全部分离,产业链出现断层,形成独立的生产经营模式。

三、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阻滞因素

农业作为凉山彝区的主导产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基于以上对农业发展现状分析,厘清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阻滞因素,对于破解农业发展瓶颈至关重要。

(一) 土地细碎化及流转障碍——资产专用性提高

土地细碎化的影响也有正面的,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20],尤其是对土地经营实现规模经济的影响。根据研究认为,土地经营单位面积的增加可以带来 2%~10% 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21]。规模经营能够促进研发投资,在知识技术、金融资本可得性、贸易物流和营销渠道等更有优势^[24],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土地细碎化对农业资产专用性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劳动力成本方面看,“按人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的土地制度,必然带来劳动要素和土地资源要素的不对称性;并且凉山彝区农民经营的土地规模小,少量的土地资源承载了较多的农业劳动力,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农业劳动生

产率,也极大地减少了土地资源的流转,提高土地资源要素的专用性。二是从时间成本方面看,小块且分散分布的土地,在耕作、打农药、收割和运输等转移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农户进行生产经营的时间。

农户间的土地流转是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标志,土地细碎化以及土地流转缺乏规范化制度,导致土地流转的成本较高,抛荒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调研发现,近十年来,由于打工浪潮的掀起,凉山彝区的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沿海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的耕地减少,土地被抛荒。有些高海拔地区目前的耕作面积甚至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50%;物产较为丰富的低海拔地区,目前的耕作面积也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约 90%,但在这些地区同时也存在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的情况,这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有关。根据高海拔 A 村村民的阐述,分散分布的小块土地邻里村民都不愿意租用,以围墙或篱笆等圈起的、能够避免牲畜迫害的、在 0.5 亩以上的肥沃土地,才有农户愿意租用,但每年的地租也只有约 150 元/亩。由于土地流转的地租低,而农户邻里的情面浓厚,很多农户要么直接将耕地抛荒,或直接免地租给邻里农户耕作,但流转的土地也仅限面积较大且土地肥力较好的耕地。而在低海拔 B 村,情况与 A 村相似,细碎化、边缘化的土地即使在靠近土地肥力厚的中间区域,土地地租也很低,耕地直接被抛荒;只有种植花椒的土地,农户以保护花椒为土地流转的条件,免去地租将自有的土地流转。因此,总体上来看,土地流转没有形成规范性的市场交易,阻碍了土地流转,土地资源要素的专用性提高,造成生产要素的浪费。

(二) 环境条件和信息技术落后——不确定性程度加深

不确定性指“产生潜在结果的重叠分布的一种现象”,产生潜在结果则涉及行为活动过程的风险大小,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路径的风险导致结果利润的多寡。因此,人们在客观环境条件和自身内在认知的约束下产生“不完美的预见性”,即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重叠增加了交易费用。

从客观条件方面看,一是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没有转变。凉山彝区的生产条件落后,农业生产主要靠当年的气候情况,如果出现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农作物的收成将大大减低,甚至没有收成。二是缺乏“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农业生产设备落后,使用的劳动工具停留在传统器具上,农业器械、大棚技术、灌溉技术等现代农业设备和技

术没有得到应用。此外,没有引进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种,这种客观条件的约束,即生产资料的约束,增加了生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了较低的生产力水平。

从主观条件方面看,一是农户对生产生活的预期,包括价格预期和市场需求预期等。长期生活在条件落后地区以及农产品自给自足的性质,农户缺乏对市场交易的敏感度,微小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在较高的经营成本之下被忽略。同时,参与市场交易的机会较少,农产品供需范围狭窄,农户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期不高。二是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分类看,偏远山区的农户属于风险规避型。正是农户对于未来市场的“有限理性预期”,绝大多数农户在生产经营上侧重短期利益,引进农业机械和农业高产品种等成本较高,但不能大概率预见未来生产收益的,就会产生抵触行为。如高海拔A村在对接帮扶单位的帮助下,大量引进汉源红花椒发展花椒产业,2017年开始全村分批次总共种植了5.13万株花椒,并进行种植技术和养护培训。但是他们对于种植花椒所带来的未来收益预期低,不重视养护,没有进行除草、施肥等,甚至在每年耕地的过程中将花椒苗耕翻,导致花椒的成活率不高,或者花椒成长的速度比较慢,需要多年才能产生收益。但是经过精心养护的家庭,其花椒在种植两年就产生收益,而且相比于原来单纯种植土豆、荞麦等农作物收入高很多倍,因此,农户现在种植花椒和养护更周到。这源于农户对未来预期的“有限理性”,增加了不确定程度。

(三) 交通设施和市场交易不发达——交易频率低

空间因素是影响经济活动密集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空间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偏远的山区,阻碍了要素在不同区际间的流动,继而影响了产品市场的形成及交易。研究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农产品交换与流动的载体,与农产品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密切相关,便捷的交通与高效的运输工具能够提高农民的收益,并能够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22]。

1. 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农产品进行交易的基础,但交通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决定了交通道路和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主导提供,投入的成本高。凉山州区域内只有一条铁路,运行的高速公路只有218公里,远低于四川省358.10公里的平均水平^⑥。这种落后的交通条件对农产品交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落后的交通条件约束下,限制了农产品的流动,在偏远的乡村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二是农产品

的不可流动性,或农产品运输中存在的“冰山成本”,当农产品运输到达目的地时,一部分农产品在运输途中“融化”所带来的损失转换为运输成本,极大地增加了产业集聚的离心力。三是阻断了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彝区生产的都是初级农产品,唯有运输到市场进行交易,才可能与加工市场相连接。

2. 市场不规范、不完善等,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搜寻交易信息的成本,提高了区际间同质农产品的价差,产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相互偏离。例如,像A村这样位于偏远山区,如农户想要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和养殖的牲畜进行市场交易,就要运输到乡镇中心去集中交易,但是运输过去的土豆、荞麦、猪、鸡和赶过去的牛、羊、马等,不一定有需求方,或者需求弱。如果没有交易成功,运输回去的费用占产品的总价值较大,或赶回去的羊体重可能减少2~6斤不等。这种交易信息不完全,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了交易频率。农户饲养的猪和羊小量交易不会参与集市的交易,最佳的出售时间过后,交易难度更高,农户养殖不能实现利润极大化。此外,根据与农户访谈,若A村出售土豆,在村上的每斤土豆价格0.4~0.5元,如运输到西昌容量5吨的货车运费2000~2500元,每斤土豆售价0.7~0.8元,如此计算每斤土豆利润0.3元,总利润3000元,减去运输费用和餐费等,利润空间为零,因此,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易的频率很小。

(四)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企业家精神缺乏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扩展生成可能性边界,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因此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是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人力资本积累的多少,不仅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生产和投资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深远的影响。

1.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常用于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从农业生产视角看,凉山州以农村人口为主,2020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306.28万人,占总人口的63.04%,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占比高。此外,农业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2020年全州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41,且文盲率还有10.80%^⑦;通过对两个贫困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4,可见偏远山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很低。

2. 凉山彝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研究报告表明,凉山彝区技能劳动力比例仅为2.88%,比四川

省平均水平低了为 4.25%^⑧。同时,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 年凉山州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4 905.17 元/人,比四川省平均水平低 1 211.45 元/人;到 2019 年该差值扩大到 5 595.93 元/人,劳动生产率差距在逐渐扩大^⑨。然而,研究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增加农民的收益,缓解贫困^[25,28]。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政府高度重视对农村劳动力农业技能培训,开展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和农业技能培训。2016 年在全国率先开办“农民夜校”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2.3 亿元,培训贫困户劳动力 12.8 万余人次,带动 17.5 万余名贫困群众逐渐改变陈规陋习,促进 12 万余名贫困群众增收 18 亿元左右^⑩。但由于贫困农户文化程度较低,农业技能培训课时短等原因,培训质量还存在不足。

四、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一) 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盘活细碎化土地

土地资源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不可流动性,但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可以让不流动的土地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之间流动,是土地资源要素流动的另一种形式。土地“三权”分置的完善,使得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相分离,从而可以整合土地资源实现规模生产经营。在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有偿使用原则,在土地承包期限内,通过转让、转包、租赁、入股等规范方式出让经营权,一是可以鼓励农户发展专业大户,或合作农场,并给予适当的补贴。如当种植面积达到一定程度,就给予农户每亩地一定的奖补,或给予适度的补贴。二是鼓励村民与初级农产品相关联的企业合作经营,盘活细碎化的土地。

(二) 优化生产经营环境,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进高产品种和灌溉技术,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一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资料,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首先是要农业生产资料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二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当使用化肥、农药等,提高土地生产力。三是引进高产品种和灌溉技术,组织农技员实施全民培训。引进高产品种,能够增强防御害虫,降低购买农药等农业生产成本;而灌溉技术缓解了农产品生产高度依赖气候条件的困境,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确定性经济风险,从而增加农业的内源性增收能力。

(三) 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完善市场机制

首先,加强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便捷的交通条件农产品能够参与市场交易,提高交易频率,将产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条件;同时,能够极大地降低农产品运输带来“冰山成本”。其次,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打造利益共同体。政府要因势利导,激励发展以龙头企业+农户、股份制合作、组建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化经营程度高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提升农户主动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内涵式发展。创新拓展农业产业扶贫的“五力模型”(陈希勇,2016),因地制宜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体,不仅能盘活农村土地和构建农产品购销机制,还为偏远山区“三产融合”发展提供新机制,强化农村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条。如充分利用昭觉县各村的“里鲁博”超市与其他企业对接,发展“农超对接”,让农村的农产品走出去。

(四)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一是强化教育投资,增加公共教育投资。凉山彝区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是最大的短板之一,不能适龄儿童入学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有高质量的教育基础设施和优秀的师资队伍来保障和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将控辍保学作为常态化机制,与基层干部的绩效挂钩,与农户利益相联结,以保证适龄儿童入学。二是强化技能培训机制,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组合能力低,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并有机会参与市场就业的主要途径。因此,加强高质量的农业劳动技能培训,从而“实质性”地提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的能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防止农户落入“粮食自给合理陷阱”的重要保障。

(五) 融合外源推力和内生动力,聚合发展合力

要实现一个地区的发展,需要聚合发展的合力,既需要外源的推力,更需要内源的动力。凉山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落后,扩散效应的微小推力不足以推动区域发展。因此,需要其他较发达的区域、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外源推力,与内源的发展要素相结合,形成发展合力。首先,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和服务性功能,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监督和引导政策实施,政府是区域合作、农企合作的主要助推力。其次,以产品为载体,以消费为动力,以企业为桥梁,搭建区域合作机制。将凉山彝区生产的绿色农产品与发达地区的消费市场连接起来,由此可以将产品供给—加工—销售—消费需求连为一体,形成合力带动凉山地区的发展。

注释:

- ① 2019年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 ②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9日07版)。
- ③ 数据来源:蒋映春.坚持党建引领决胜脱贫攻坚,《凉山日报》,2020年9月15日。
- ④ 即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突破土壤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方法。
- ⑤ 数据来源:集思广益解决葡萄滞销问题,《凉山日报》,2019年11月13日。
- ⑥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2020》。
- ⑦ 凉山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 ⑧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2014):25-36。
- ⑨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 [1] 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 [2] 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1):15-31.
- [3] 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学术月刊,2018,50(7):39-45+59.
- [4]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5] 林毅夫.经济结构转型与“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4):1-8.
- [6] 洪银兴,刘伟,高培勇,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18(9):4-73+204-205.
- [7] 黄修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为例[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1,38(4):699-708.
- [8] 刘涛,李继霞,霍静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0):1-8.
- [9] 辛岭,安晓宁.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分析[J].经济纵横,2019(5):109-118.
- [10] 黄修杰,蔡勋,储霞玲,等.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4):124-133.
- [11] 张默,孙科.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水平测度及评价研究[J].农业经济,2021(5):6-8.
- [12] 姜华.新时期、新定位、新目标下的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研究[J].保险研究,2019(12):10-17.
- [13] 夏显力,陈哲,张慧利,等.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
- [14] 王可山,郝裕,秦如月.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易制度变迁与网购农产品消费促进——兼论新冠肺炎疫情对生鲜电商发展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4):21-31.
- [15] 孙江超.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导向及政策建议[J].管理学报,2019,32(6):28-35.
- [16] 钟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农业发展导向[J].中州学刊,2018(5):40-44.
- [17] 沈满洪,张兵兵.交易费用理论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2):44-58.
- [18] 李杰义.农业产业链视角下的区域农业发展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8.
- [19] 李杰义.农业产业链视角下的“以工促农”机制的动力模式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3):24-30+110.
- [20] 陈培勇,陈风波.土地细碎化的起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9):90-96.
- [21] 许庆,尹荣梁,章辉.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3):59-71+94.
- [22] 李慧玲,徐妍.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8):25-30.
- [23] BECERRIL J, ABDULAI A. The impact of improved maize varieties on poverty in Mexico: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7), 1024-1035.
- [24] COLLIER P, DERCON S. African Agriculture in 50Years: Smallholder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3:92-101.
- [25] DE JANVRY A, SADOULET E.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 25(1): 1-20.
- [26] HOSSAIN M, BOSE ML, MUSTAFI BAA. Adoption and productivity impact of modern rice varieties in Bangladesh [J].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6, 64(2), 149-16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9-05-03).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3/c_1122774230.htm.
- [2] 秦书生, 李毅. 习近平高校立德树人思想的逻辑阐释[J]. 现代教育管理, 2019(8): 2-8.
- [3] 王炳林.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EB/OL]. (2018-02-15). 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2/15/c_1122402302.htm.
- [4] 黄箬. 微文化时代大学生网络话语权的提升路径研究[D]. 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 2018.
- [5] 戚义明.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EB/OL]. (2019-02-26). 求是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226/c40531-30902140.html>.

(上接第46页)

- [4] 颜小燕.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2): 13-19.
- [5] 李少惠. 甘南藏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困境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15(4): 132-138.
- [6] 赵富学, 王发斌. 我国“体育援藏”政策的特征与启示[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26-29.
- [7] 毕阳. 习近平出席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0-12-15]. https://www.ccps.gov.cn/xt/202008/t20200829_142973.shtml.
- [8] 黄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2-15].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上接第87页)

- [27] KIJIMA Y, OTSUKA K, SSERUNKUUMA 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NERICA on income and povert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Uganda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 38(3), 327-337.
- [28] LOAYZA NV, RADDATZ C.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3), 137-151.
- [29] MINTEN B, BARRETT CB.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in Madagascar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5), 797-822.
- [30] WU H, DING S, PANDEY S, 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on farmers well-being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in Rural China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10, 24(2), 141-160.